

华南日本研究丛书之一

中日

文化

比较文学 比较文化

研究

佟君 陈多友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 / 佟君, 陈多友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306-02232-6

I. 中… II. ①佟… ②陈… III. ①比较文学—中国、日本—文集 ②比较文化—中国、日本—文集 IV. ①I206-53 ②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613 号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楚天

责任校对: 易正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84036565

印 刷 者: 广州市番禺市桥印刷厂印刷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19 印张 4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50 元

印 数: 1~1500 册

序 言

在我国，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比较语言、比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业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且我国学者与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呈现出日益广泛且频繁的趋势。2001年12月8日至12日，在我国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由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日比较文学会以及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联合举办了主题为“2001中日比较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新世纪中日文学关系的展望与回顾”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其势磅礴，其意深远，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日本、西班牙、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学者百余人。与会学者分为“日本古典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文化”和“日本语言”四组，进行了热烈且颇具建设性的交流与论争，研讨会获得了极其可观的成果，对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日本学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大力促进了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合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时隔将近两年时间，我们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审查，在原学术研讨会上所宣读的优秀论文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其他未来得及在该研讨会上宣读发表的高质量的日本学研究论文，正式以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华南日本研究丛书”之一）这一形式出版。这也算得上是近年来中日双方日本学研究领域前沿科研成果的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总结。此类出版活动今后也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相信此举会对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日本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以及扩大并深化对日学术交流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此次由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主办、中山大学佟君教授与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陈多友副教授主编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华南日本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日比较文学、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诸多领域，论题新颖，具有非常大的学术纵深和宽广的辐射面，具体内容有日语语言、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中日比较文学等等，共收录论文41篇，撰稿者来自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10多所国内院校，兼有数位颇具代表性的日本学院派专家学者积极投稿。通过严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梳理，我们将全部内容分作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三个部分进行编辑，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便于日本学研究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阅读。

总之，本书的出版，象征着我国华南地区日本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迎来欣欣向荣的局面。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该丛书之二、之三……；我们将立足于求实与创新，严守学术规范，把优质先进的日本学学术科研成果奉献给广大的读者与研究者，为加深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强化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多做贡献。我们衷心企盼各位大家前贤给予厚爱和指导，同时也殷切期望广大读者与研究者给予

大力的支持。

此次《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华南日本研究丛书”之一)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中山大学出版社全体同仁特别是熊锡源先生的鼎立支持,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广州日本商工会的部分赞助以及广州留东同学会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编 者

于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2003 年 11 月 12 日

目 录

上编 文学研究

比较文化研究中“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	严绍璦 (3)
中国的王梵志诗与日本的王梵志诗	藏中进 (14)
志賀直哉「城の崎にて」解釈	佟 君 (22)
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文学研究	陳多友 (30)
论紫式部对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受容	
——兼论外来文化本民族化的融合范式	姚继中 (43)
《源氏物语》中的平安汉诗文	
——以大江朝纲的《王昭君》为例	佐伯雅子 (51)
《日本灵异记》的编纂与《搜神记》《法苑珠林》	
——关于神仙传类故事的存在	河野贵美子 (57)
郁達夫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	顧也力 (64)
假面下的“悲剧”	
——试论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	陈克城 (72)
村上世界和几米世界的交融	譚 冰 (81)
围绕女色论的十世纪日中传奇文学	
——《莺莺传》与《源氏物语·梅枝》	菊地真 (90)
传统与现代的冲击	
——论日本近代女性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章 毅 (100)
文化视野中的中日隐逸文学	丁国旗 (105)
梁啓超と『佳人之奇遇』	
——その翻訳の諸問題をめぐって	谢崇宁 (119)
文学作品中有效使用敬语对表现人物关系所产生的作用	
——以夏目漱石《明暗》为中心	吴少华 (127)
论白居易《白羽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橋姫”卷“扇ならで、これしても月はまねきつべかりけり”考	黄建香 (134)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	詹懿虹 (139)

中编 文化研究

徐福传说在日本

——从古代到 16 世纪	柴田清继 (147)
--------------------	------------

法象与杂体·····	王一鸣 (益鸣) (156)
传统家居 (イエ) 与日本文化 ·····	陈 竞 (162)
黒住宗忠の思想の特質に関する一考察 ·····	林 丽 (169)
日本の佛舞	
——寻找佛舞在中国的源头 ·····	村上美登志 (178)
日本女性の社會進出とその問題	
——中国との比較 ·····	谭 冰 (183)
「家」及び「家族観念」の中国人と日本人·····	李春植 (189)
从中日法文化的历时性比较看日本文化的基本结构 ·····	吴之桐 (196)
中日游民文化之比较	
——论日本的部落问题 ·····	李东军 (201)

下编 语言研究

论古代汉语在日语训读语法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以“是”“有”和定语后置为例·····	杨金萍 肖 平 (209)
中文之“罗生门”	
——语义及语源分析 ·····	蔡爱芬 (218)
华人学生的日语汉字学习 ·····	大北叶子 郭俊海 (222)
浅谈格助词“から”的用法及其有关格助词的区别 ·····	安淑英 (231)
日、中同素异序对应词的异同特征 ·····	龙 江 (234)
日汉形容词对比研究 ·····	王黎今 (239)
外国語を喋る際外国人なりの意識が必要 ·····	赵毅达 (245)
小论日语的语义双重性 ·····	王黎今 (250)
伝達の態度のモダリティ	
——「ネ」と「ヨ」について ·····	曾紹琼 (255)
言語と文化との関わり	
——言語教育に於ける文化知識の重要性 ·····	張盱余 (260)
中日両言語における連体修飾語の語順	
——動詞類を中心に ·····	張佩霞 王彩麗 (268)
“なに”和“なん”的区别 ·····	安淑英 (274)
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	
——谈谈日本人的应答方式 ·····	宋晓真 (276)
日语身体词汇惯用句的结构特征 ·····	李冬松 (281)
影响大学生日语学习成就的因素测评研究 ·····	王 琪 (286)
附录：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简介·····	(295)

上 编

文学研究

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

严绍璁教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 是一个“好名词”, 也是一个“坏名词”。说它“好”是因为比较文化研究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新的视野”, 沿着近二百年来这一领域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经验和学者们自己的思索, 我国比较文化研究学者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其中有些成果, 相信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惠泽于后世。但是同时,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我国学术界中那些东拉西扯高谈所谓“欧美论说”, 捕风捉影拼凑所谓文学关系的“文化垃圾”, 其中确实有不少东西也都是打着“比较文化”或者“比较文学”的旗号, 一时间被鼓噪而登上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当人们从它们高深莫测的外包装中真正地闻嗅其气味的时候, “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又常常成为一个“坏名词”了。

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常常触动感情, 有时候理性认识会被情感所迷惑, 研究者的智慧被“名誉地位”、被“钱财实利”甚至被“政治欲望”所消蚀, 比较研究仅是作为宣泄感情、张扬情绪的场所。双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在有些房间里, 正在以所谓“文化产业”的牌照, 堕落为上述欲望的奴婢。对于这样的“研究者”来说, 无所谓“学术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说, 所谓研究与研究的结论即作为所谓“文化产业”的目的与一切“资本的投资”相一致——即获利的目的是事先已有的, 只不过是用“研究”的标牌来包装自己, 以便在“学术”的伪装下欺瞒善良的读者。他们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 实在是做了最丑陋的示范, 使一些人跌入所谓“目的是明确的, 结论是预先设定的, 方法是随意的”这一学术研究万劫不复的深渊。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了。它是我国比较文化研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并且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时候, 不能不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 所谓方法论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学术观念问题, 又是一个学术知识问题, 也是一个研究者的学风问题。从近十几年来一些所谓的研究来看, 方法论问题其实根本上是涉及研究者的人品道德的问题。

目前有不少的所谓“研究”, 由于在方法论上走入误区, 他们的结论或许一时被称为达到了“新高度”, 成为“新学说”, 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 展示其光怪陆离的轰动效应。然而, 它们毕竟经不起文化事实的验证, 许多的“成果”会变成“文化垃圾”, 或许当这些“成果”还在“创建”的当时, 在开始张扬的一刻, 事实上它们已经是“文化垃圾”

了。这些“文化垃圾”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因此，方法论问题对于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揭示异质文化的相互关系方面愈来愈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者，一个诚实的研究者，现在应该大声疾呼：学术文化的研究，要充分重视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因人而异。每一位成熟的研究者，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从而使学术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但是，无论其方法论具有多么独特的个性，作为对一个共同的主题的研究，则必须遵循符合科学的原则。所谓方法论的“科学的原则”，我以为这便是揭示或接近“文化事实”的原则。如果有一种研究，其结果是离“文化事实”愈来愈远，并且还执迷不误，并且还以此换得来地位与钱财，那么，即使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蜂拥而上，即使得到多大的政治力与经济力的支持，在文化学术史上，它只能是“伪命题”、“伪学术”、“伪科学”。当然，它们在文化学术史上也有作用，这便是警示同行，避免在类似的状态下再次跌入误区，并且显示各种非学术的欲望一旦介入学术研究之中，对真正的学术研究，将会造成的是多么重大的腐蚀和损失！

我在这里慎重地提出，双边文化关系或多边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的方法，应该是“原典性的实证研究”。

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从根本上来说，人文科学的研究，许许多多的命题都处在“假设”之中，都是研究者的一种“判断”。这些“假设”、这些“判断”，我们不可能运用实验的手段来加以证明。因此，自然科学者中有人嘲笑人文科学是“想像者的乐园”。但是，人文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不只是因为它具有了认识人文现象的观念形态，而且还因为它已经具备了揭示内在逻辑的系统性手段。人文研究虽然不能运用“实验”加以证明，然而，它却可以运用“实证”加以推导，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正因为如此，我坚持认为，“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双边文化关系或多边文化关系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论。

“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我以为它包含了下面五个层次：

尊重学术研究史；

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

原典材料的确实性；

实证的二重性；

研究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

我想就这一操作系统的五个层次做一些说明。

—

原典性的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地尊重学术史的成果。所谓学术史，就是本门学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是本学科与本命题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实证的研究来说，尊重学术史，就是为自己的研究建立起必须的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研究前提。

目前，中国人文学界有些研究正处在“无前提”的状态中。例如，中国第一大报《人

民日报·海外版》在1994年曾经连续两次发刊同一则报道，介绍河南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与一位女博士一起论证了孔子的先祖是河南人而不是山东人。假如说，这真是这位教授和博士的研究，那就令人震惊。难道有哪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文学者会认为孔子的祖先真的是山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吗？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已经写明孔子的祖先是“宋人也”，所谓宋国，就在今河南省治之内，这难道还会成为问题？还需要河南的教授和博士来设置命题，来花费我国国民的税金来进行“研究”？还要劳《人民日报》重复刊登报道加以宣传？还需要我们的国民再掏腰包重复购买这在2000年前已经明确的事件报道吗？在我想来，这位教授与这位博士，在河南一定是名声大噪，荣誉满身了。

这是典型的“无前提”研究。当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一旦失去了学术史的前提之后，就会为学术无知者、为心理狂躁者、更为欺世盗名者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堂。

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实证观念，要求至少应该在两个层面上重视学术史的成果。一是对设置的“命题”，应该充分掌握“命题”内各项概念的学术史演进的轨迹。例如，有一篇论文题为《風流からみやびへ》（“风流”在奈良或万叶时代曾经读做“みやび”，后来去掉了汉字“风流”两字，直接写作“みやび”，再后来将“雅”也读做“みやび”了。编者注译，下同），命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作者忽视了“风流”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它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论文只是以中国古代后期社会中民间通俗的“风流”概念来与日本“万叶”初期以来的“みやび”（“雅”）相比较，从而出现命题概念错位。二是必须对设置命题的已有的前辈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清理。从学术文化史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的相关研究，都是总体学术史上的一环。人文学术发展到21世纪之初，任何人的研究命题，以及与命题相关联的怀疑、联想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前辈学术的基础上的，完全“创新”的理论是没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自己的理论有三个来源，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邓小平理论称毛泽东思想是它的根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我国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声称自己的研究是“第一次”、“全新创见”的，实在是太多了。最近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评审委员会收到一篇论文，是关于日本国号考定的“研究”，论文一开始就说，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论述日本国号问题，具有开创学术研究的功绩。不仅作者自己这么写，就连专家推荐也这么说，这就令人十分奇怪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就研究日本的国号称法，有过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远的不说，1990年以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在日本》这本书的第一章叫《日本的发现》，就是对“日本”国名的由来研究。1998年以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第四台已经多次播出过30分钟分量的“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专题，其中也涉及了“倭”、“日本”等名称的形成，远在美国和欧洲的学者都已经在相关论文中引述了上述中国学者的见解，怎么我们近在咫尺的国内的学者反而在那里梦游神说呢？评审委员会拒绝这样的论文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从学术史的立场上说，没有学术前提的所谓研究，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二

关于“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则，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作为

研究的材料,对研究的客体(对象)来说必须具有“原典性”。一是指作为“研究的材料”必须是“本国”或“本民族”的材料,即作为论证中具有主体意义的材料必须是母语文本材料。

所谓论证中的材料对研究的客体(对象)来说必须具有“原典性”的原则,指的是“材料”与“对象”必须具有时间上的(时代意义上的)一致性,即为论证命题提供的材料,必须与命题所体现的时间具有“同步性”,或者至少应该具有“趋同性”。例如,要把中国文化史中的“徐福的传说”变成“徐福的历史”,论证中所必须具备的“原典性材料”,则应该与“徐福的时代”具有一致性的材料。徐福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人,那么,关于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就必须具备与这一时间区域相一致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那些热衷于把“传说”改写为“历史”的学者们振振有词地拿出来作为“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材料,最早的却是公元17世纪的文献。用两千年后的文献记录,来证明两千年前的“事实”,这样的文献、这样的材料,就没有什么“原典性”可言,材料不具备“原典性”,结论当然也就不会正确。当代中国人文学界与中日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所谓的“徐福研究”具有充分的典型意义——他们创造了一种首先设定结论,然后再进行一些不需要任何前提的所谓“研究”,然后便宣称结论的正确性。这是把学术当作游戏。当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因为就为一些人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变态心理所支配,所以它就不可能进入到学术的轨道上来。但它告诉我们,纯洁的学术环境与真诚的学术心态,对于学术文化的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材料的原典性”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对双边文化或多边文化的研究来说,作为“研究的材料”必须是本国或本民族的“原典材料”,即作为论证中具有主体意义的材料必须是母语文本材料。这里便涉及到对他国与他民族文学的“译介”的问题,或者说是文学的“译介”与“比较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毫无疑义,“译介”是两种文学与文化接触的主要渠道,它作为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具有自身的学术意义。但是,比较文化(文学)的研究,是不可以依靠“译介”来进行的。比较文化(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本中进行,这便是另一种“材料的原典性”。作为翻译家的“译介”,与作为研究家的“研究”,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活动,不可合而为一。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可以完全一一对等的语言文字,因此,“译本”与“原本”的不整合,是客观的事实。如果再加上翻译家内内外外的各种条件,译本与原本的差异自然会更大了。在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翻译家设置的“陷阱”之中的“事故”,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台湾学者夏冰语在他的大著《脏话满嘴粗话连篇,美利坚总统都爱国骂》中说,“(约翰逊)对他的化妆师吼道:‘小子,你他妈的滚蛋!’”;“(杜鲁门对《坦白话》作者默尔·希勒说)‘我告诉你,蒋介石他从来就是他妈的不好!’”大著又说“英俊潇洒形象良好的肯尼迪,私下也是‘他妈的’等粗语琅琅上口的总统。”(载《新闻报》周刊1995年8月12日)。夏先生在文中所指的所谓“国骂”,显然就是由鲁迅先生解析的汉语国骂词“他妈的”了。鲁迅先生非常准确地破译了它的意义是“你的妈妈被我使用过”,这是一个隐性的“性词汇”。夏先生例举的美国总统的骂词是“shit”、“bitch”“fuck”、“fuck off”,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词具有与鲁迅先生释义的汉民族的“国骂”相一致的内涵,都与汉族的这个“国骂词”的境界不相一致。至于有人把日语文作品中的

“ばか”、“ばかやろう”、“くそ”、“なにくそ”等译成“他妈的”，更是离题万万里了，因为日本文学中几乎没有涉及“性”事的骂词，利用这样的材料来做“骂词”的研究，岂不是上了大当！

目前，中日文学（文化）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仍然被“译本”所羁绊。最近读了一篇研究日本民族“色彩观”的论文，在论述日本人倾向于“青色”时，引用了杨烈先生翻译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纪贯之的和歌：

外子有青衣，洗時如降雨；雨淋草上春，草綠添嬌姪。

杨先生的译笔很美，节律犹如五言汉诗。但是，原歌词是这样的：

わがせこが　衣はる雨
ふるごとに　野べの緑ぞ　いろまさりける

原来，在纪贯之的原歌歌词中，有“衣”而无“青色”之说。所谓“青衣”，只是汉译者的自我意会。这种意会体现了译者对日本审美意识的理解，我们毋须对此做什么价值评价。问题是研究者本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忽视了应该遵循的材料的“原典性”，没有使用母语文本，故而提出了一个与研究本题毫无关系的文本来作为论说的依据，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了。

三

所谓“原典材料的确定性”，这是指在双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在已经具备了原典材料的条件下，必须甄别原典材料中的哪些材料是具有“确定性”的，——所谓的“确定性”，即运用的材料在论证命题的逻辑推导中，具有无可辩驳的、无法推倒的实证性作用，它对“命题”的成立，具有根本性的支持价值。

关于日本古代最早的物语《竹取物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自江户时代以来，论争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但却莫衷一是。正方与反方使用的其实都是同一材料，即中国秦汉时代“嫦娥飞升”的传说。正方认为，《竹取物语》的结尾就是仿照“嫦娥飞升”的传说；反方认为，为什么不能说“嫦娥飞升”的传说是仿照了《竹取物语》的故事呢？在双边文学或文化研究中，当一个材料可能被推导出双向影响的结论时，一般说来，这样的材料便不具有“确定性”。这一实例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同时代原典材料都具有“确定性”，只有那些反映文化事实本质的原典材料，才能在双边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然经过对东亚文化史的研究，同时对世界文化史的考察，我们现在有把握地说，在解决“嫦娥飞升”的传说与《竹取物语》的故事等的关系方面，已经获得了具有“确定性”的原典材料。

这一具有“确定性的原典材料”便是关于世界神话中普遍的“日月神本体论”与中国

汉民族神话在秦汉之际从“日月神本体论”向“日月神客体论”的变异。原来，几乎全世界的关于太阳与月亮的神话都是“本体论”的形态，即太阳与月亮都是作为“神”的“本体”显现于世的。希腊的日神阿波罗与月神阿尔忒弥斯是兄妹；日本的太阳神天照大御神与月亮神审月读命是两姐妹；中国汉民族的神话中，日神的母亲羲和与月神的母亲常羲是帝俊的二妃，所以日神与月神都是帝俊的儿女。《楚辞·九歌》中描述的作为太阳神的“东君”，驾龙舟、载云旗、上着青衣、下着白裙，举长矢，射天狼，是一位英俊的武士。总之，日神与月神，它们作为“神”的“本体”，具有鲜活的生命形态。然而，在秦汉时代于汉族文化圈内发展起来的“方士”，他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所谓“方术”活动中，臆想在大地之外的海洋和天空中存在着“不死之地”，于是开始了关于把人送往月亮中成仙的构想，这种构想运用“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嫦娥飞升”的传说。在这则传说中，月亮再也不是具有“鲜活生命形态”的“神”，而是成为臆想不死的仙人们的居住区了。早期的“日月神本体论”在这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月神客体论”。这一新的幻想性观念，在全世界神话中具有明确的汉民族文化特征。日本古代既然不存在“日月神客体论”的观念，那么，关于《竹取物语》的结尾的构造在发生学方面的困难也就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解析了。

原典材料的“确证性”，用司法界的行话来说，便是提供“死证”。

四

双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一般都是依据文献进行的。但是，实证方法论不仅注意到文献的确证性，而且也尽量注意到运用文物参与实证的可能性，我们称之为“实证的二重性”。就中国学者而言，自觉地运用二重实证法是从20世纪开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甲骨文字的出土与敦煌文献的发现，刺激了学术方法论的重大革新。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撰写《三代地理小记》一文。这一论文与其说是获得了一种研究结果，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古史研究的新思维——即古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此种实证，又必须建立在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基础上。王国维用大量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印证文献，遂为不移之论。

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凡是能运用文物材料的，应该尽量运用，使结论更加深刻而生动；凡是必须运用文物材料的，缺少了这一部分，就不能提出准确的结论。例如，关于前述“徐福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必须具备有文物材料才能确证的命题，然而，主张徐福到达日本的学者们，至今也未能提供任何起码的文物证据。我曾经对所谓徐福登陆的四个日本地点做过实地调查，不仅没有找到任何实物证据，相反，原发地的文物却可以更加证明“徐福在此登陆”的不可靠性。

我在《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出版社刊）的第一章《日本的发现》中，曾经提出，中国上古时代记录“原日本人”为“倭”，这是一个人种译名。此即是Ainu人的最早的汉译。“倭”在上古时代作“委”，“委”属“哥”部，发“A”音。吴语上海话把“倭”读若“A”，便是近上古音。所以，“倭”便是“Ainu”的直音。《后汉书·东夷传》记“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献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处称为“倭奴”的长

音,更接近“Ainu”的本音。事实上,在汉语中,“倭”字多用以构成连绵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它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几年前,《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发回一个报道,说国家某通讯社负责人参观日本九州,那里有一个“倭国”和一个“奴国”,这显然是据《魏志·倭人传》中列数日本列岛所谓各“国”名称而说的。但当时《魏志·倭人传》的作者因为不懂日语发音的特征而把“Ainu”这样一个表示种族和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词活活地拆成了“ai”和“nu”两个不知所云的音,制造了“两国论”,实在是应该纠正的。保守的史学家们长期囿于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可以运用实物材料作证。原来在日本九州志贺岛早就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有“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印玺确证了“倭奴”就是“委奴”,“倭”读若“委”,“委奴”就是“Ainu”。

应该说,假若没有文物参与作证,关于“倭”、“奴”和“倭奴”的论证还可能延续多少年,现在,由于提供了原典性的实物证据,“倭奴”即为“Ainu”我认为应该是不移之论了。

在双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实行“二重证据”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我在关于东亚原始图腾的考证中、在关于与日本“梅原古代学”就日本神话的某些发生学方面的问题的论证中,在关于日本早期物语文学的构造的解析中,都引入了“实物”证据。由于文献与文物的相互印证,这就使实证具有了二重性,结论也就更加符合文化史的实际。

但是,当我们在运用“实物”参与实证时,对“实物”本身的“确证性”,研究者也应该具有学术的警惕性,“实物”的本来的鉴定者,由于知识的缺陷,或由于功利的驱使,也会制造一些指鹿为马、指蛇为龙的陷阱,给研究者造成困难。因此,研究者也应该具有相当的文化史的知识,包括文物的知识。

五

人文学术的研究,说到底,它实际上是以研究者的“主观性判断”来处理各种“客观性材料”的学术性活动。人文学术的成果,正是处于“主观性判断”与“客观性材料”的交接点上。因此,研究者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就成为最重要的条件了,由此便可以获得进行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良好主体境遇。

所谓“健全的文化经验”和“良好的主体境遇”指的是研究者不仅要在使用的材料上具有原典性,而且,作为研究者本身,他还应该具备两种以上文化氛围的实际经验。这种文化的实际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在于体验下列四个方面的经验:

(一) 必须具备关于对象国文化的综合性的体验

本来,关于这一个要求,在研究者中是不应该有歧义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学者,在对对象国文化几乎毫无综合体验和把握的状态下,就任意命题,见风使舵,发表些不三不四的见解,影响舆论,误导青年,甚至获得功名利禄。近二十年来关于日本当代社会是所谓“儒学资本主义”的命题在这方面便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

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几乎没有综合性知识的状态下,开始对当代日本

社会性质随意发表见解。他们既没有日本思想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不知道日本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命运,不知道它曾经是构成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基础;又没有在战后的日本有过真正的生活(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真正的”三个字,不是像某些媒体先生那样在日本逗留过十几天就开始对日本做出一些评论的那种生活),更没有对日本的社会与经济乃至企业运作和民众生活做过什么像样的调查。几乎是在毫无综合知识装备的情况下,妄言“儒学”对日本的近代化如何如何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提出“儒学资本主义”的概念,以便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区别。在他们的论述中,“儒学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崇尚人际关系、上下协调、以和为贵、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大大优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具有“亲切”感的资本主义。他们的说法,对熟知日本的人来说,好比是天方夜谭一样。其实,当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中,在书房中为津津乐道的“儒学”在“资本主义的日本”取得了“重大成就”而手舞足蹈的时候,这个国家内含重大的经济的危机已经初露端倪了。现在,由于日本经济在低谷中徘徊,且难以提升,当年海阔天空地谈论日本“儒学资本主义”的学者,他们几乎全体实行了“命题回避制度”,大家都闭口不再说往事,甚至放弃了这个题目。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人反省这个命题的荒谬性,以及造成这种荒谬性的原因。

然而,我们作为这一命题的批判者,却应该从中引出反省,驱除功利主义的目的,从学理上来说,研究者必须有健全的文化经验,对研究的对象的文化一定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把握,由此来获得进行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良好主体境遇。

(二) 研究者必须特别体验本土文化与对象国文化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并掌握这种差异

研究者在双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可以体会到两种文化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几乎遍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当中,是否理解与是否掌握这种差异性,则关系到研究的准确与深入。

曾经有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就中国的一分钟小说《强刺激》提出困惑。这篇小说只有三百来字,写一位女青年因为煤气中毒而昏死,医生抢救、母亲哭喊、男友呼唤、领导来宣布提升工资……一切一切的办法都不能把她救活,然而这时有人在她的身边只是轻轻地说:“你快醒醒,有人说你和他……,你不说的话,这事就讲不清了!”这时,女青年忽然仰起脸,大声地说:“胡说,你这是胡说!”日本学者始终也不明白,这“强刺激”到底是什么,但是,中国读者一读就会明白。

日本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到中国很有名的一所大学任教。校长宴请教授,二人有如下的对话:

校长说:“先生您一人到中国来,您的太太不会有问题吧?”

教授答:“我太太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了,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聋子的对话”。两位都是名人,但是两位对于对象国文化的生活特征都是毫无所知的。

如果研究者不能把握两种文化的生活观念的差异,在研究中就会造成重大的误差。例如在关于对日本“记纪神话”的理解上,天神Izanaki和Izanami下降创造日本,二神在大地上分别演变为“男性神”和“女性神”,神话以直观的和自然的手法,展示了这一演

变的过程，表露了男女“性器”的形成与作用。由此而透露的生活观念与汉民族的生活观念有着非常的不同。汉民族在“性”的表现方面，从儒学的立场上来说，表现为“发乎情，止乎礼”，也有人说“外乎礼，内乎淫”，总之，汉民族的研究者对日本民族表现的这样的对生命的激情，一般作负面的理解。有人认为，日本神话是日本“色情”文学之始。有位主张日本当代社会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的先生，在论述中便举日本人至今推崇 Izanaki 和 Izanami 神话，论证其民族品格低下。这就造成了生活意识的“判断错位”，只要在研究中发生这样的意识“判断错位”，其研究的结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是准确的了。日本民族在神话中表露的“性”，是与生命的创造相联系的，这是一种对生命产生的渴望和激情，具有民族情感的尊严性。这一特征可以说一直影响着日本文学与文化的意识。

（三）必须体验双边文化中的“语义”的差异并把握这种差异

双边文化的研究者不一定是语言学家，但是，研究的宗旨决定了他或许比语言学家要更加关心两种文本中的“语义”的差异。

法国杂志《星期四周刊》（1991年1月31～2月6）曾经有一篇题为《给交战者上一堂语义课》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中布什与萨达姆之间“可怕的对话”。当萨达姆攻占科威特的时候，他估计美国是不会动手的。美国人准备教训萨达姆的前夕，布什说了非常粗野的话。美国总统说：“我们要用酸菜塞满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收听到了这句话，他只认为这是美国人吓唬他的，他不知道这句话所表示的意义的严重性。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正式动手对付希特勒时也曾说过“我们要用酸菜塞满希特勒的屁股！”这句话的语义是表示美国人真正地愤怒了，真的要动手了！可惜，萨达姆好像没有理解它的语义而不予以理睬，但是美国的坦克真的开进了沙漠。

这段故事对比较文化研究者来说则是更加意味深长的。它告诉我们，理解不同民族之间“语义”的差别，是感知一个民族文化氛围的基本内容。

一般非日本人在掌握日语方面都知道“いいです”具有“好的”、“可以的”等正面肯定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恰恰是这个“いいです”，也可能具有“もういいです”的含义，即具有“否定”性的“到此为止”的含义。这是日本民族的体面主义心理特征的表现，细小的差异会造成对民族心态诠释方面的重大的误解。（相关故事略）

（四）特别体验文化氛围中的“美意识”经验

中日两国民众对于“美”的感受很不相同，表现在文化中的“美意识”就不相同。我曾经劝导某作家读一读世界上第一部写实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后来作家给我写来一张便条说：“好不容易耐着性子读完了这一部书（丰子凯译本共三册），实在读不出一个‘好’字来。”《源氏物语》在日本文艺史上，是确立日本古代文学审美意识的既是经典性又是奠基性的作品，然而，在中国真正能欣赏它的读者层却是相当微弱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便是审美意识的隔膜。作为中日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者，如果也存在这种隔膜，那就不会有言中之肯的见解了。

我们常常提到日本近世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这也是日本近世文艺